

高则诚南戏考论集

侯百朋 ■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高则诚·南戏考论集

侯百朋□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则诚南戏考论集/侯百朋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24 - 08320 - 0

I. 高… II. 侯… III. 高则诚 - 南戏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I 207.3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4940 号

高则诚·南戏考论集

作 者 侯百朋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彩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6 开 9.7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320 - 0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上 编

- 高明出仕与归隐思想初探 3
高明史料辨 13
高明史料掇拾 22
新发现的有关高明资料两件 30
高明不卒于元至正十九年 38
高明亲属考 40
高则诚在宁波 46
方志所见有关高则诚资料 57

高则诚诗文汇辑 70

下 编

- 瓯歌与温州戏文 93
戏文中的温州方言 98
关于祖杰的戏文 107
论《琵琶记》蔡伯喈形象的改造 109
《宣德写本金钗记》校注补 119



一枚荆钗系两心 128

从方言俚语谈《荆钗记》的作者 136

谈世德堂刊本《重订拜月亭记》 142

后 记 152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上

编



高明出仕与归隐思想初探

高明字则诚，浙江瑞安人。他创作的《琵琶记》，蜚声剧坛，传唱不衰，盛时甚至达到“演习梨园，几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闾阎，每奏一剧，穷夕彻旦，虽有众乐，无暇杂陈”^①的地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琵琶记》塑造了勤劳、坚强的赵五娘形象，描写了蔡家一门悲剧的命运，这里面，有蔡公、蔡婆、赵五娘的酸辛和眼泪，也有蔡伯喈的矛盾和痛苦，揭示了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朝廷黄榜招贤，蔡伯喈被逼赴试应考，谋取“金章紫绶”，终而至于“孩儿相误，为功名相误了父母”，“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②从而批判和抨击了科举制度和仕宦道路。高明用形象的、生动的描写，宣告了赴试出仕是条通向灾难、痛苦和死亡的道路。在此基调之上，交织进灾荒、贪污、婚姻制度、官宦的不自由等内容，构成了一幅怵目惊心的元代社会图。像《琵琶记》这样的主题，在元代以前的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读书—科举—出仕，这是封建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公认的理想道路。为达此目的，他们埋头在古书堆里，老死在场屋之中。而高明却通过《琵琶记》大喝一声：这是条通向灾难的道路！多么大胆，多么尖锐！

高明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主题？这主题表现了高明的什么样的生活见解？“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上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元代的社会，从作家的世界观，特别是其中的出处观中找到答案。可惜由于高明史料的散佚，对高明的出处思想，要作出全面的准确的分析，是困难的，只能从残存的零星的资料中，作个初步的探索，借以作为评价作家、理解《琵琶记》的参考。

高明的一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从无意参加科举考试到应举中试踏上了仕途，最后又是辞官居鄞，坚决不再出仕。正如友人陆德旸在吊高明诗中说的：“乱离遭世变，出处叹才难”。在出处问题上，他是有着一番踌躇和感慨的。

高明出生在瑞安县飞云江南的崇儒里柏树村。这是个偏僻的小乡村，背靠



着飞云江，东濒东海，潮水大时，涛声隐约可闻，西、南两面，一片平畴，远处是连绵的青山，正如《琵琶记》中所描写的：“坐对送青排闥青山好，看将绿护田畴绿水洊”。高明的家庭，是个诗人、隐士的家庭。祖父、伯父都是诗人，尤其是他的伯父梅庄先生，诗写得好。崇儒，又是个诗人、隐士的乡里。同里的陈家，跟高家是亲戚，世有姻连，陈家祖孙四代、十五人都是诗人，都能为文作诗，且有通晓音律的。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少年时代的高明，没有受过多少严格的应付科举的训练，倒是耳濡目染，杂学旁收，向学有专长的长辈学写诗，学为文，学音律，学习各种知识，所以明·凌迪知说他“性聪敏，自少以博学称”^③。温州又是南戏的发源地。明·祝允明在《猥谈》里说：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余见旧牒，其时有赵闾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

明·徐渭的《南词叙录》记载：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

对产生于民间、盛行于民间的温州戏文，在通晓音律的长辈指导下，高明当会有所接触，有所喜爱。这一切，为《琵琶记》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年青时代的高明，和家人过着“师友一门兄弟乐”^④的生活，没有汲汲乎追求应考取得功名。以后，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实行羁縻政策，重又开科取士，受着祖父的督促和他人的影响，他才下决心攻“举子业”。陈与时写的《送高则诚赴举兼简梅庄兄》一诗的末联说：“此去鳌头应早得，翁翁种德已多年”^⑤，这“翁翁种德”，既是赞扬他祖父的为人，也包含有祖父对孙儿的期望、教育和督促。这使得高明“一日叹曰：‘人不专一经取第，虽博奚为？’乃自奋读《春秋》，识圣人大义。”^⑥高明去应考的另一原因，是他跟其他一些封建知识分子一样，也抱有经时济世之念，希望从此而能有所作为。他在暑天游家乡宝积寺时写的《游宝积寺》诗中，表明自己的愿望：“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⑦。他的乡人回忆高明谈过自己的抱负：

入践廷宇，陪老成之谏议；出临郡邑，布恩德于罢氓；使殊功茂绩，炳然一时，以答清朝设科盛意，且非君平昔之志，而亦吾党所望于君者哉！^⑧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高明于至正四年（1344）乡试中举，第二年登进士第。从无意仕进，终于还是踏上了仕途。

高明从至正五年中进士后，起初任处州录事，接着是江浙行省属掾，以后又到绍兴、庆元等地方任事，至正十九年除福建等处行省左右司都事，二十一年（1361）调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前后十多年，任的大都是地方上的属僚，就官阶来说，也只是从正八品的将仕郎到正七品的承事郎，最后又降为从七品的徵事郎。尽管高明有吏治才能，宦途奔波，仍然是仕路蹭蹬，官运淹蹇。

从一些记载来看，高明出仕后，为官清正，能为老百姓做些好事。处州录事任内，“学道爱人”^⑨，“时监郡马僧家奴贪残，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⑩。从“委曲调护”四字中，我们看到了高明的困难处境：既不可得罪监郡，又要能使老百姓免受或少受害，他周旋其间，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民才“赖以安”。也因此，“去任，民立碑，青田刘基为撰文”^⑪。任江浙行省属掾时，他“核实平江圩田，蠲租米无徵者四十万石”^⑫，这中间，老百姓多多少少得到了一点苏息。庆元路推官任内，“凡狱囚无验者，悉讯遣之”^⑬。在元代，的确是“冤狱遍于国中”，老百姓动辄得咎，哪管你“有验”、“无验”。在这种情况下，高明“悉讯遣之”，他要承受多少压力，担冒多少风险！须要勇气，更须要有为老百姓办点事的决心。在旧志书的记载里，难免有溢美之辞，但是在高明为官的几个地方的志书上，都有诸如此类的记载，可见高明确为官清正，能看到老百姓遭受的某些痛苦，想为老百姓办点事。在《题画龙》一诗里，高明写了龙“倾天瓢”后，“乾坤万里苏旱暵，草木无言生意悦。归来高卧碧潭云，独抱神珠弄明月”^⑭题的是画龙，实际上是抒写自己的愿望和志向。这跟出仕前写的《游宝积寺》里的思想感情是一脉相承的。高明能这样做，同他青少年时，住在乡间，接触到下层人民，了解老百姓的某些疾苦有关。试看他的岳父陈昌时写有《哭牛行》、《江头叹》、《牧牛儿》、《岁歉叹》、《覆舟行》、《雨中叹》（“耕者一何苦，食之一何修，仰天行叹息，岂敢为私愁”）和内兄弟陈冈写有《田家即事》（“相逢因说为生苦，荒土于今亦税麻”）^⑮等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不是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一点吗？高明吏治才能练达。赵汭称他“行中书闻其名，辟丞相掾。儒生称其才华，法吏推其练达……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⑯。杨维禎赞其有政绩：“某年，某官来总行省事，求从事掾之贤能者，首得一人焉，曰沙可学氏；又得一人焉，曰高则诚氏；又得一人焉，曰葛元哲氏：三人者用而浙称治”^⑰。高明的吏治才能表现在多方面。“每他掾有故，辄以兼其事”，他干得相当卖力，也很出色，“君稽典册，定是非，酬应



如流”^⑦。特别是任庆元推官期间平反冤狱一事，这须有干练才能，熟悉当时的法纪，了解当时的现实情况，能够分清是非，确定有无，作出判断，予以平反，使无辜者得以昭雪；在“平反允当”中，又要能堵住上司的嘴，使挑剔不出毛病，这是件不易之事，而高明能很好地予以处理，赢得了“图圉一空，郡称为神”的赞誉。

高明有一股鲠直的脾气。他不肯同流合污，如他在《采莲曲送越中吴本中》一诗里所称颂的：“君心如花不污泥，亭亭洁立当清漪”。碰到不顺眼，看不惯的事，他就要发“鲠”脾气，或者摔乌纱帽。在江浙行省属掾任内，“意所不可，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前程功名，一点儿也不顾惜。在“征讨”方国珍幕中，“时浙东帅达公，以除凶为己任，一见君欢然。既开幕府，乃以论事不合，避不治文书”^⑧。顶撞了上司，自然捞不到升官，可他也无所谓。“久拼华发添青镜，未许缁尘上素衣”，他宁可“久拼华发”，不愿、更不许染上“缁尘”，以保自身的洁素，这正是此老鲠直处。他在至正十三年写的《题〈晨起〉诗卷》中，说陆游“夫放翁不以世俗哀，而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耶？”^⑨他为陆游辩白，正也反映了他自己的思想态度。所以他“数忤权势”。像高明这样的人，在那样的社会里，自然要吃亏。结果，他不得不“谢病去”。

十多年的地方任官中，高明也干了一些蠢事。比如在处州任上请旌表陈孝女事，宣扬了封建的愚孝。

从至正二十一年到朱元璋建国的洪武初年，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他人生道路的第三个阶段：寓居鄞县栎社沈氏楼，以词曲自娱。

在他为官的十多年中，他对功名厌恶了：“莫说市朝事，功名欲逼人”。退隐的念头时时泛起。他发牢骚：“人生万事空浮沤，走舸复壁皆堪羞。不如煮茗卧禅榻，笑看门外长江流”，他慨叹：“飘零王粲辞家久，牢落潘郎感发稀”，他羡慕隐逸倪瓒：“何似云林倪处士，焚香清坐澹忘忧”，可他又不能归去：“孤松三径依旧在，童仆正迟陶渊明”，他只得自勉：“何如洁白长相守”。这之中，他也写了诸如《送苏伯修参政之京兆尹任三首》、《寄月彦明省郎二首》等应酬之作，歌功颂德，反映了他思想上庸俗和恋栈的一面，但赋“归去来”则是主导的。尤其到晚年，这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决然退隐了，这就是方国珍留他在幕中的事。

台州方国珍于至正八年起事，势力逐渐扩大，终至于拥有温、台、庆元等处，并接受元朝的封号与官职。方国珍罗致了一批名人、文士在幕下。高明早有绝意仕途的打算，方国珍的邀致，正给他一个好机会，他“力谢”了，索





性连元朝的行省都事官也不去上任，以后的典籍官，南北道路梗阻，亦没有去，寓居于鄞县。到洪武初年，他的一些好友如刘基、陈基、赵汭等都到南京去，在朱元璋手下，或做大官或修元史，朱元璋征召他，他也以“心疾辞”。可见他去仕的决心之大。

但是高明辞官后，也不像一般文人逸士，放浪形骸，徜徉山林，以诗酒自娱，度着悠哉游哉的岁月，他没有忘掉现实，他“以词曲自娱”，在写作他的《琵琶记》。有人传说他在沈氏楼上三年，足脚按拍，板为之穿；有人传说他含着泪写“糟糠自厌”出，满怀同情地塑造赵五娘的形象。传说终归是传说，不足为据，但是透过这些传说，可以看到高明集中了他的全部心血，来从事《琵琶记》的创作。尽管作品里含有较多的糟粕，但精华毕竟是主要的。高明没有忘情世外，他仍用笔来表示了与元代统治者的不合作。

这以后不久，他就病卒了，归葬家乡，伴着涛声，长眠在飞云江南的土地上。

这就是高明一生走过的曲折道路。

为什么高明入仕后又要归隐？为什么晚年退出仕途的想法这么坚决，无论是方国珍、元朝、明朝统治者罗致、除官、征召一概拒绝了？是些什么因素促使高明毅然作出这一决定的？

任何士人的归隐，固然有他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又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必然地受着社会的政治的诸矛盾所制约。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是士人归隐的常见的原因，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②。高明生活的年代，正是元代末期，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混乱不堪，加上他个人的经历、教养，于是，他就选择了“退而著书”这条道路了。

具体说来，高明的辞官归隐，有着这么一些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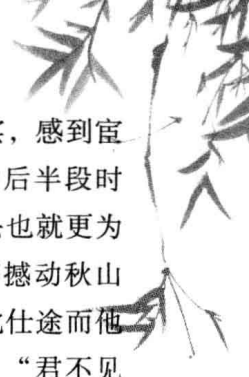
元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朝代之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烈、尖锐，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高明身为下层官吏，亲身感受到吏治的黑暗、腐败，看到了老百姓某些困窘处境。他又是个较正直的知识分子，不愿参与其间，因而对自己的为官，时时感到矛盾、痛苦，终至于拂然而去。

他一开始做官，就碰上了马僧家奴的贪残为害，他虽“调护”，却只能“委曲”；为官四明，更进一步感到封建法制的黑暗，冤狱累累。“苛政猛于虎”，这自古以来的看法，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在《题画虎》一诗中，他写道：“人间苛政皆尔俦！”这岂止是在题画，这是高明内心不满和愤怒的呐喊！在《琵琶记》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有着更具体的描写。《琵琶记》是文艺



作品，所描述的，不等于就是作者自己的经历，也不能用作历史资料来作佐证。但是文艺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者从现实社会中，撷取哪些材料，怎么处理这些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描写采取什么态度，都可以从中看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琵琶记》“驿站”一出里写的两个丞相随员，狐假虎威，敲诈勒索，特别是“赈粮”一出里的里正等，不正是元代社会下层役吏鱼肉乡里、残害良民的现实概括？作者憎恨这些作伥者，一再让他们上场自我表白和招供，从而鞭笞了这些人的丑恶灵魂。张大公在听了赵五娘请粮被抢的哭诉之后，痛责里正：“空吃人的五谷，枉带人的头颅，身着人的衣服，一似马牛襟裾”，直抒胸臆，仗义执言，愤激不平之气，化而为言辞，把这批凶神恶煞，骂个狗血喷头，痛快淋漓！正是“原来恁的，我与你骂那厮一和”的痛骂！这难道仅仅是张大公在骂？不。这是作者在骂。作者在借张大公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要是作者对仕途尚有留恋的话，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至于对上层官僚，作者也予以揭露，只是没有这般锋芒毕露罢了。那个“极富极贵的牛丞相”，权势熏天，蛮横专断，生死予夺，全凭他口出。蔡伯喈辞婚，高明借用下人的口，道破这样的残酷现实：“迂阔。他势压朝班，威倾京国，你却与他相别。只怕他转日回天，那时须有个决裂。”以后的具体描绘，事件的发展，完全证实下人这个看透世情的说法。正是这位牛丞相，亲手制造了赵五娘一家的痛苦。在《乌宝传》一文里，高明更把乌宝的性格形容成“外若方正，内实垢污”“为人多诈，反复不常”，说“宝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时有以使之”，矛头所指，不是很明显的吗？高明是个有抱负的人，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初为官的时候，他还想有所作为，也曾表现出“意所不可，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的书生气，可是处在黑暗的官场里，诸事备受掣肘，他的抱负一直未能得到施展，壮志莫酬，抱恨无穷，然而又无可奈何。到后期，元代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镇压越来越厉害，高明看到了这些现实情况，面对这样黑暗的现实，高明一筹莫展，但是又不愿混迹其间，沉湎一气。他写诗给老朋友诉说自己的苦恼：缅怀尘纷劳“安得舍所趋，白日澹无营”，他唱出了“莫将尘土污儒冠！”阶级的局限，使他又不愿投身到抗元的农民义军中去，于是只有辞官，虽然是消极的举动，却表现了他的与元代统治者的不合作的态度，以保持自己的“素衣”“未许缁尘上”。反映在《琵琶记》里，就是告诉人们：不要赴试为官。二者是一致的。

终元一朝，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帝宝座的斗争十分激烈。元代最高统治者对臣下又充满了不信任，陟罚无常，杀戮有日，“朝为座上客，暮作阶下囚”的事经常发生。再加上封建社会官场内部猜忌攻讦，尔虞我诈，不择手段，争



斗倾轧。有十多年仕宦经历的高明是有所体会的。认清官场中的现实，感到宦途上充满了残酷和危险，这是他退隐的又一个原因。特别是为宦的后半段时间，处在受压抑的地位，对官场的现实，看得更为分明，退隐的念头也就更为坚决。在《题画虎》一诗中，他写虎威：“黄芦风紧杀气寒，啸声撼动秋山月”，实在是写“人威”，所以他感到“山空月冷不可留”，他要离此仕途而他去。这里面，有着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在送友人的诗篇中，他指出：“君不见东邻少妇织锦工，织作步障围春风。春风一去花草歇，金谷寒蛩怨秋月”，他用形象的语言，隐约地勾画出官场瞬息变化的现实，处身官场的危险。他在自“征讨”方国珍幕罢职返省垣，拟回家隐居的饯别宴上：

笑谓座中曰：“前辈谓士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②1}

一取得爵位，就是忧患的开始，从前卑其言的高明，仅仅经过五六年的仕宦生活，不仅不卑其言，而且相信这个说法，这个变化是何等的大。尽管他带笑说出，却隐含了多少辛酸与沉痛！在《琵琶记》“询情”一出里，牛小姐问：“你有什么不足只管锁了眉头也？”蔡伯喈回答道：“我穿着紫罗襦到拘束我不自在，我穿的皂朝靴怎敢胡去揣？你道我有吃的呵，我口里吃几口荒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倒不如严子陵登钓台，怎做得扬子云阁上灾。”蔡伯喈内心战战兢兢，时刻担心“扬子云阁上灾”突然降临的状态，不是跃然纸上？“扬子云阁上灾”事见《汉书》：王莽诛杀甄丰父子等，凡有关连的人，可不必奏请，径行收捕。关联人物之一的刘棻，仅仅“尝从雄（扬子云）学作奇字”，因而也牵连到扬子云，“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免，乃从（正在校书之天禄）阁上自投下，几死。”^{②2}蔡伯喈的倾诉，难道不正是高明自己心灵的反响？心怀惴惴，朝不保夕，造成一种严重的精神威胁；随着岁月的流逝，危机感日益加深，急流勇退，尚可实现“得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以时游赤城、雁荡诸山，俯涧泉而仰云木，犹不失吾故也”^{②3}的许诺，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只是高明没有回老家，也没与乡人子弟共处，他怎能忘情现实，超然物外？他寓居鄞县，写作《琵琶记》，来批判元朝最高统治者在末期所竭力倡导的笼络士人的应试为官的道路。

年轻时乡里、家庭的熏陶，以后一些友朋的影响，也是促使他归隐的重要因素。

在元代，归隐的士人特别多，这是有其政治的、阶级的、民族的诸因素为



背景的。元代社会，士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科举又长期停顿，撤除了士人唯一的晋身之阶。其有附元的也只能做到蒙古人的“副贰”，对于“行省长官，不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士人阶层中，有的在“民族气节”思想的支持下，隐遁山林去了，有的耿介不阿，佯狂避世去了，有的看透世情，啸傲风月去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为这些人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于是，隐士就大为增加了。高明的家和他岳父的家，都是隐士的家庭，虽则有几个长辈，先后做过一些地方的小官吏，最后也都回家隐居；另有些长辈，就一直未出仕，或则在乡讲学，或则和友朋诗酒唱和。督促他去应举的祖父曾发过牢骚：“年过半百耻为儒，万事随流可暂娱”“蹇驴无复问长途”（《书怀》），他的伯父也唱叹：“世间名利空牢落，岂似山僧得晏眠”（《晓起》），他的舅祖陈则翁感慨道：“世路翻手交，闭关谢来吁”（《半云庵和答林霁山》），他的岳父说：“问余栖隐地，只在白云根”“已存栽竹地，不买种花园”（《周公访别业》）^②，他们的思想，对高明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高明早年居幽慵斋，写了一首自咏诗：“闭门春草长，荒庭积雨余。青苔无人扫，永日谢轩车。清风忽南来，吹堕几上书。梦觉闻啼鸟，云山满吾庐。安得嵇中散，尊酒相与娱。”清静淡远，俨然似一位隐者，与他从舅祖的“闭门潇洒入窗明，一洗浮生梦幻情。夜月静移花下影，晓风轻度竹间声”（《清虚堂》），岳父的“野草行无路，孤舟入有门”、“眼底饶苍翠，南山带别村”（《周公访别业》）^③格调何其相似。他后来要弃官归去时对乡人说的归去后“犹不失吾故也”的“故”，指的就是年轻时这种“洁身”的生活，他念念不忘这种生活。在出仕中，碰到矛盾、苦恼时，更常勾引起对年轻时的这种生活的恋念。在《次韵酬高应文》一诗里，高明写道：

曾向天涯钓六鳌，引帆风紧隔银涛。

江山有恨英雄老，天地无情雨露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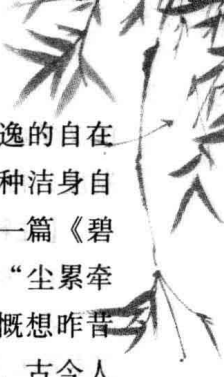
七国游谈厌犀首，十年奔走叹狐毛。

争如蓑笠秋江上，自鲙鲈鱼买浊醪。

他想有所作为而不能，厌倦奔走而欲归隐又不得，对元代统治者颇有些不满，化而为愤激不平之气，充溢于字里行间。因而不免感叹：“黄尘冉冉貂裘老，殊愧南邻桑苎翁”，不免发问：“天运亦有常，吾生何时宁？”由此可想见他心绪的苦闷与对过去乡居生活的怀恋。这种因素，促使他最后拂袖而去了。

从现有的资料看，高明的交游中，好多是隐逸，如倪元镇、顾仲瑛、徐方





舟、倪仲权、陆德旸、李仕开、杨季常、高应文、魏仲远昆仲等。隐逸的自在生活和自己的纷扰生涯，形成强烈的对比，愈使他羡慕这些友人；这种洁身自在的生活，也就愈吸引着他。顾仲瑛筑了个玉山佳处隐居，高明写了一篇《碧梧翠竹堂后记》，着力描绘了它的深幽清雅。当他“余以公事有程”、“尘累牵掣，不得少留”，不得不归来，“比至城郭，车马杂遝，尘坌瀚起。慨想昨晋所游，则已疑为梦中见矣！”他不禁感慨系之：“余又见史传中所载，古今人物类皆功名势位之人，而以洁身遁世称者，仅一二见。岂非山林泉石之乐，固少有得之者邪？”所以在文章的最后，高明托来人“为我语仲瑛：君碧梧翠竹之乐不易得也，第安之，他日毋乃汨于禄仕，若予之不能留也。”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对老友의劝告，包含了他为官后的体验和对洁身自在生活的向往。高明对于人生，有他自己的追求。他说：“人生温饱不足多，莫羡东家著绮罗。”在封建社会里，大多数士人趋炎附势，蝇营狗苟，高明却抱“虑澹趣常足”的态度，这是难得的。所以最后，当他“岁晚仲宣犹在旅，年来伯玉自知非”知入仕途之非后，得到机会，解官而去，也就不会有什么惋惜和顾瞻了。

他的归隐还有别的因素，以上这几方面，则是主要的。

综观高明的一生，虽曾为官十多年，归隐的思想却占主导地位。归隐是消极的。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没有参加进去，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所致。但从元代的社会，从高明的具体情况来看，他的弃官归隐，则表现了他看到元朝吏治、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不愿再混迹其中而所采取的一种“跪着的反抗”，表现了他的清正耿直，坚持洁白自许；何况他弃官归隐以后，“仍以词曲自娱”，撰写《琵琶记》，揭露黑暗的旧社会。对高明的一生，对高明的这个行动，不能一笔骂倒，说什么“就其一生来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儒士和封建卫道者”；不能随心所欲地编造，说高明“年老回乡后，则一心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从而证明他坚持封建卫道者的立场^②，这是不符合高明的实际，不实事求是的。

从高明的一生里，我们也可看到，腐朽的旧社会容不得一个正直者的。在仕途上，他是个失败者，失败得多好！却使他在文学上取得巨大的成果。他把自己十多年为宦的经历，在宦海浮沉中尝到的苦辣酸辛，他把自己对老百姓痛苦的同情，对元代社会的理解与认识，都凝注在笔端，创作出我国著名的古典悲剧《琵琶记》，而《琵琶记》的出现，又大大提高了温州戏文的艺术性和地位，推进了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受到人们的欢迎。陈毅同志说：“《琵琶记》赵五娘剪发、描容、挂画诸节，其悲苦动人之处，迄今恍惚犹在心目。”^③高明

的文学成就是不能抹杀的。说什么《琵琶记》是“抹杀矛盾斗争，粉饰封建制度，帮助维护封建反动统治的反革命工具”^②，也是欠公允的。

【注释】

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

② 《琵琶记》原文，均引自《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不再注明

③⑥ 《万姓统谱》

④⑤⑭ 《元瑞安阁巷陈氏清颖一源集》

⑦ 所引高明诗，见近人冒广生《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柔克斋诗辑》，下不再注明

⑧⑨⑮⑰⑱⑳㉑ 《东山存稿·送高则诚归永嘉序》

⑩⑪ 乾隆《温州府志》

⑫ 嘉靖《温州府志》

⑬ 乾隆《瑞安县志》

⑯ 《东维子文集·送沙可学序》

⑰ 所引高明文，见拙编《高则诚文辑》，载《文献》第十一辑，下不再注明

⑱ 《论语·卫灵公》

㉒ 卷八十七本传

㉔㉕ 上引诸诗句，均见《元瑞安阁巷陈氏清颖一源集》

㉖㉗ 《安徽师大学报》1975年第二期《〈琵琶记〉是儒家戏曲的反动标本》

㉘ 《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陈毅同志与苏北的文化工作》